

紅樓夢評論集

李希凡 藍翎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红楼梦评论集

李希凡 蓝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红楼梦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272,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 2

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089 定价 0.94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场尖锐的斗争 (代序)

——学习鲁迅论《红楼梦》的几点体会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

从“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到三十年代战斗的左翼文学，在开辟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光辉战斗中，鲁迅给我们留下的革命的文化财富，包括着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关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遗产的著作，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又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非常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他在一九三四年曾经充满革命自豪感地宣称：“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②事实正是这样，尽管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横排本，下同）658页。

② 《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批判地评价和继承中国小说遗产方面，却做出了至今仍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的卓越的贡献。他对中国小说史的资料做了大量搜集和校勘，编辑出版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并在深刻透彻地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前者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的讲义，后者是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暑期讲学的讲稿。

鲁迅在这两部小说史的著作中，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和发展，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名作，以及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思想艺术成就的高低，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精当深刻的分析和评论。特别是对中国古典小说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红楼梦》，包括由《红楼梦》而引起的中国小说史和《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鲁迅不仅在他的小说史著作中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做出了精辟、独到的评价，而且在他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文中，对利用和歪曲《红楼梦》以宣传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新红学派”的“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和“新月社诸君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的许多看法，直到今天，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对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对于认识思想文化史以及小说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有着很深刻的现实战斗意义。

在一九五四年的批判“新红学派”的一些文章中，我们曾经引用过鲁迅对《红楼梦》及其有关问题的部分观点，以批驳“新红学派”的谬说，这也是使我们确信必须批判“新红学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据。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关于学习鲁迅的教导领会得不深，因而，未能在思想上引起高度的

重视,对鲁迅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著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也就失去了结合斗争实践学习鲁迅,并运用鲁迅的这些见解而进行斗争的好机会。这对于我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参加当时的那场思想斗争,以及深入地分析和评价《红楼梦》,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多次学习鲁迅著作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也积累了一些资料。现在,乘《红楼梦评论集》重新再版的机会,把它写出来作为“代序”,以弥补这个缺憾;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也算是一次思想上的补课。

二

要全面了解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所进行的尖锐的思想斗争的性质和意义,首先有必要对《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作一简单概括的考察。

曹雪芹的《红楼梦》自十八世纪中期问世以后,很快地在封建士大夫和市民阶层中间传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竞相阅读,热烈争论,有的人对之“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的人甚至为了品评书中的人物“遂相齟齬,几挥老拳”。但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官僚及其卫道者,却把这部小说视同寇仇,宣布它是“淫书”,并加以烧毁和查禁。只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它依然在群众中广泛流行,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社会风气。并且从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的现象。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这些“红学”通称之为“旧红学”;“五四”以后,又出现了所谓“新红学”。两派“红学”,延续一百多年,产生了不少的专门著作。由

此可见,《红楼梦》影响之大,以及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斗争之激烈,是中国小说史上任何一部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红学”,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大战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围绕着《红楼梦》所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而持久的斗争。

最早的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要算脂砚斋。曹雪芹一边写作,他一边批注。与他同时或稍后,还有别的人在抄本上写的批注,这些批注也一并流传下来,后人通称之为“脂评”。“脂评”对曹雪芹的身世和写作,都提出了不少可贵的材料和线索,在《红楼梦》的研究史上有一定的贡献。但“脂评”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和研究小说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却是开了“旧红学派”的先声,甚至影响到“新红学派”,在不少的“红学”著作中,把“脂评”错误部分发展得更远了。他们抛开《红楼梦》艺术形象的整体,穿凿附会,生拉硬扯,专去搜求所谓“微言大意”、“皮里阳秋”之处。这些“旧红学派”的成就甚微,而其流毒却不小。他们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常见的,形形色色的所谓评点派、索隐派,都走着这条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其共同的特点。当然,在“旧红学派”中,也不是没有个别可取的见解,但就其主流讲,就其思想的阶级根源讲,基本上是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同《红楼梦》所表现的反封建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是不相容的,所以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接触《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成就。

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社会舆论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大谈小说的风气。他们把小说当作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这一点和以前轻视小说的看法大不一样,也和“旧红学派”的“索隐”、“抉微”有所不同。其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政治要求，是反对封建阶级传统思想意识的一种表现。但是，由于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待小说的社会作用的，因而，不是把古代小说作为文学的遗产去评价，而是想直接拿来作宣传工具，所以他们的很多解释往往和作品所表现的实际内容相距太远，变成了借题发挥，从而歪曲了作品。例如，先是戊戌变法的“康梁新党”后来变成老保皇派的梁启超，在一八九八年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评价不谓不高。但他是就小说比经史子集的通俗易懂而言，是指的形式语言问题，而一谈到具体作品的内容，如《水浒》、《红楼梦》，他就贬之为“综其大较，不出海盗、诲淫两端”，并献策说：“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仍然是强烈地表现了他的改良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又如，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来变成了大汉奸的汪精卫，一九一五年以季新的笔名写了《红楼梦新评》，认为《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中国之家庭组织，蟠天际地，绵亘数千年，支配人心，为中国国家组织之标本。国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国家。”“欲变更国家组织，而不先变更家庭组织，正如水之无源，木之无根，必不能久”。变更家庭，必从唤醒“良心”入手，《红楼梦》是这方面的最好教科书，“故我不能不大有望于《红楼梦》了”。这实际上完全歪曲了《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曹雪芹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的写照，揭露了（其中也有批判）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以及形形色色的腐烂的生活现象和精神面貌，其艺术效果并不是在唤醒“良心”，更不会起到正统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而是深刻地暴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再如，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蔡元培先生，

虽然为了反帝反封建奋斗了一生，既不同于保皇派的梁启超，更不同于最后变成卖国贼的汪精卫，但他在一九一六年写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用从清初就有的反清复明的旧观点来索隐《红楼梦》，把曹雪芹说成是反清复明的先驱，却未免穿凿过甚，对研究《红楼梦》，没有提出任何有益的见解。这三种错误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们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小说的看法，却还谈不上对《红楼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只有王国维在一九〇四年写的《红楼梦评论》，算是第一次从文学典型塑造的美学观点对《红楼梦》做出了他自己的解释。但是，王国维却是站在即将灭亡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夸大宣扬《红楼梦》中的封建糟粕，妄图从《红楼梦》中寻找人类的所谓“解脱”之道，走向了开历史倒车的绝境。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间，《红楼梦》的研究虽然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同以前的一百多年的研究相比，从思想观点来看，却没有根本的变化，《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仍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相反的，他们研究《红楼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本质上仍然是在沿袭“旧红学派”的传统。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既不可以忽视“旧红学派”的不良影响，又不可以对其中个别可取的见解给予过高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五四运动中，文化革命运动是其重要的一翼。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

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和这场文化革命运动中，一向不能进入文学艺术之林的小说戏曲，也得到了重新的评价。于是，《红楼梦》的研究又成了这一领域中的不同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首先出现了一个以胡适、俞平伯等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他们以打倒“旧红学”建立“新红学”自命。不能说这个“新红学派”较之“旧红学”毫无成就。在本书的《“新红学派”的功过在哪里？》一文中，我们曾经给予它在考证上的成绩以一定的评价。但是，必须指出，这个“新红学派”是产生在资产阶级右翼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进行分裂活动之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文化革命的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惶恐不安。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文人，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革命口号之后，又打出了“整理国故”的黑旗，向封建势力投降，并大肆贩卖实验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所谓“新红学派”，也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是发表在一九二一年。而由于《红楼梦考证》的发表，也同时引起了俞平伯的“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的“系统的研究的兴味”。从此，他们以小说考证为幌子，特别是以《红楼梦考证》为蓝本，狂热鼓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实验主义的考证学，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新红学派”延续三十多年，亦即“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②，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它所以能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长期地占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658 页。

②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统治地位，就是因为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他们的反动的文化政策所需要。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在全国解放以后，它才有条件又同刘少奇、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融合起来，受到他们的保护，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继续毒害青年，继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争夺文艺阵地。

但也正是当“新红学派”刚刚产生而喧闹一时的时候，一九二〇年前后，鲁迅也开始了艰巨的中国小说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着对《红楼梦》的全面研究。尽管这时鲁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是以革命家的态度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革命派，不仅与胡适派完全不同，而且在当时就猛烈地抨击了胡适派“整理国故”的鬼蜮伎俩^①，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正是贯串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

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就表示了他要为小说治史的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为什么“自来无史”？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御用文

① 鲁迅把反“国故派”的斗争同整个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揭露：“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询问时，鲁迅也与胡适派妄图引诱青年脱离现实斗争的主张完全相反，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青年学生应该“少看中国书”，并强调“现在的青年”必须走出研究室，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即“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人在思想上对于小说和戏剧是瞧不起的，是不把它们列于文艺正宗之林的，特别是对于元、明以来多少具有反封建思想色彩的章回长篇小说和戏剧，不仅瞧不起，而且是长期围剿，横加摧残。所以，翻开史书看一看，“儒林传”、“文苑传”里散文家、诗人、画家等比比皆是，可有几个小说家和戏剧家？中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地位之卑微，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尽管几百年间小说广泛流行，而人们对于作者的情况则所知无几，甚至直到现在，有的小说的作者也还是一个谜，查不出，猜不破。鲁迅的这句话，应理解为愤慨之言，愤封建地主阶级对小说的压迫；又应理解为发奋之言，要为中国古代小说修史，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可以说《中国小说史略》是前无古人、启迪后来的开山之作。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例如虽至今日，而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今天所讲，就想不理睬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①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鲁迅这时虽然还是进化论思想的信仰者，但他整个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他为之战斗的实践，却显然已不是进化论所能概括的了。因而，他所阐发的进化的观念也同胡适的庸俗进化论有显著的区别。胡适只看到事物数量的缓慢变化，只看

①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到事物现象的变化，因而提倡一点一滴的逐渐改良，反对革命。鲁迅则是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运用进化论观点的，其中既有着唯物主义的因素，又有着强烈的要求战斗的内容。鲁迅并不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自然进化，而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能取得进步。早在一九〇七年，他就提倡“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①，强烈要求勇敢革命，改造“现实之世”，他自己当时的实际行动就是“勇猛奋斗”的革命实践。

第二，鲁迅在讲了上述那段话以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的《灯下漫笔》里，直接表明了他的历史观。鲁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总结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②是人吃人的“人肉的筵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③这里虽然还表现了他看不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偏颇的思想观点，但鲁迅却已经看到了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现象，因而要推翻旧世界，这样的历史观是有了唯物主义因素的，而且是向着历史唯物主义转化着的。这以后不久，鲁迅就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就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观察一切了。

第三，鲁迅是按照上述的历史观来分析中国小说史的。比如，讲到小说的起源，认为它和诗歌一样，或产生于“劳动时”，或产生于劳动之后的“休息时”，以“借它忘却劳苦”。小说和诗歌

① 《坟·文化偏至论》。

② 《坟·灯下漫笔》。

③ 同上。

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民用劳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化。鲁迅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成果,是显示了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特色的。

第四,鲁迅是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也就是说,要披荆斩棘寻求出“自来无史”的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论证它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产生的,产生以后有什么影响,又如何继续向前发展的。这就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就书论书。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曾经说过:“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他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已有了萌芽的表现。鲁迅先论证了小说的起源,进而讲了“神话与传说”,“汉人小说”,“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及《世说新语》之类,“唐之传奇文”,宋、元、明之“话本”和“拟话本”,元、明、清之长篇章回小说,等等,从远古直到二十世纪初,上下几千年。对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阶级社会的每一种小说形式的产生,都要首先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统治阶级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知识阶层的思想状态,社会风气之所向,文化发展的水平等等。然后才讲某一种小说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而不在另外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它受到哪些人的欢迎,受到哪些人的反对;它本身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什么样的成就,对以后的创作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等等。鲁迅的研究是特别注意作家和作品的思想的。他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①不但美术家如此,文学艺术家都应如此。比如,鲁迅比较

了《水浒》和清末《三侠五义》之类的“侠义派”小说以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②紧接着就分析了产生后一种思想的社会根源，指出这一类的书所以大都出现于晚清的光绪初年，是因为当时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曾经镇压了几次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等。有些人充当了清王朝镇压人民革命的帮凶，立了功，引起了一些人的羡慕，并影响到当时北京的说书人，拿他们的事迹做评书。实际上，这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爪牙立传的帮凶文学。所以，我们读鲁迅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著作，总会看到，对每一种小说的分析，都能究其源而穷其流，抓住了本质和主流，理清了来龙去脉，使读者一目了然，的确挖掘出了“一条进行的线索”。尽管这时鲁迅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高度，但在当时国内外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却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革命的科学著作。

将鲁迅关于中国小说史的革命的科学的著作和同时期出现的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加以对照和比较，就不难看出，后者是不折不扣的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贩卖反革命私货的标本。胡适的这部书，是在五四运动的革命统一战线发生了大分化以后写成的，这时他已经站到反革命的阵营里去了。胡适直言不讳地说，他做小说考证的目的，就在于“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③。因而，这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际上就是他借以宣

①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②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③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传实验主义唯心论的反动工具。不错，胡适也讲了文学的进化。他说：“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周秦有周秦的文学，汉魏有汉魏的文学，唐有唐的文学，宋有宋的文学，元有元的文学。《三百篇》（笔者按，即《诗经》）的诗人做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也做不出《三百篇》。左丘明做不出《水浒传》，施耐庵也做不出《春秋左传》。”^①但是，为什么文学会有这种史的变迁和进化，为什么章回小说会产生，胡适却讲不出道理来，更找不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形态的变化和差别，是不能用它本身的表现来解释的，必须从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来说明，因此就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观点加以分析。但是，胡适出于他反动的阶级本能，恰恰是要反对这样作的，所以，他不愿也不敢去探讨这史的规律，而只能把小说研究局限在考据学里。如“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②当然，我们并不抹煞考证工作的重要性，问题在于胡适把他这种鸡零狗碎的考证工作，强调到“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③的程度，无需去探讨规律性的问题，这就显然是别有用心了。因为在胡适看来，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根本就不存在自己的固有规律，规律是人造的，只存在于人的主观设想中，而且随时可以抛弃，另代以别的设想。正如他说的，“律例（笔者按，即规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

① 《胡适文存》上册卷一197—198页。

② 《胡适文存》下册卷三200页。

③ 《胡适文存》上册卷二286页。

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①。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是典型的实验主义的功利观,有用就是真理,没有用就不是真理。真是有奶便是娘,哪管她是驴是马,是人是狼。他的一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正是彻头彻尾地实践了这种实验主义考据学的反动主张,全书以“假设”的“律例”布置成烦琐考证的迷魂阵,充满了偶然现象的堆积,毫无规律可言。请看他是怎样靠“假设”的“律例”分析我国几部优秀的章回小说的。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答曰:是他一时“高兴了”,用来“发挥一肚皮宿怨的”^②。吴承恩为什么写《西游记》?因为“著者一定是一个满肚牢骚的人”^③,为了宣泄“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④,所以写了这“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⑤,而且孙悟空的形象还是来自印度的进口货。写小说就是为了发泄个人的“宿怨”或“牢骚”,书中的人物成了传声筒,既不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可言。用这样的观点研究和分析文学遗产,分明是挂羊头卖狗肉,借研究之名,行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虚无主义之实。俞平伯在他的《红楼梦辨》里,大叫大嚷:“《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⑥,正是胡适这种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具体发挥。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研究开拓道路的人,既不是在旧中国统治学术界的买办文人胡

① 《胡适文存》上册卷二78页。

② 《胡适文存》下册卷三142页。

③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356页。

④⑤ 同上书366页。

⑥ 《红楼梦辨》中卷222页。